

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汇编
(四)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

正确评价民国军事人物初探

何 硕 丰

党 振 国

广州军区百科第一编审室

1986年11月3日

正确评价民国军事人物初探

何 硕 丰 党 振 国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如何正确评价民国军事人物，同样是研究中华民国史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几年来，通过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部分民国军事人物条目的实践，我们深深体分到，能否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不仅关系到对这些人物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法，而且直接涉及到对其所处这段历史的认识。评价历史人物恰当与否，对当代和后人客观地全面地认识这些人物以至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半经典性著作的百科全书，其影响更是如此。

在研究和撰写民国军事人物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一是资料少。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左”的思想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中华民国史几成禁区。因此，缺乏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资借鉴的专著、论文、资料甚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只是刚刚开始。二是观点各异。国共两党进行了多半你死我活的斗争，反映在史料上也是针锋相对的。双方历史研究者因立场、观点各异，即使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也迥然不同。国民党出版的书刊，把他们许多军事人物称为“名将”、“军事家”、“国之栋梁”等；而我党过去的书刊、报纸则大都将国民党军事人物称为“人民的敌人”、“刽子手”、“战犯”等。三是研究民国史特别是评价这个时期的军事人物政策性很强，它与我党的现行统战政策尤其是对台政策密切相关。所写国民党军事人物不只关系到对作古者的评价，而且关系到活人，既影响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也牵涉到被撰写人物的后代、亲属和老部下。这些情况，增如了研究和撰写民国军事人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怎样突破这些困难，力求比较正确地评价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的

军事人物呢？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划框框，不抱成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历史，评价人物。

一、把是否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评价人物在历史上地位作用的基本标准。

要正确评价人物，首先必须树起明确的标准。列宁说过：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①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政党包括个人作用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现实，反复证明一个浅显的真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生产者，没有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可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日渐提高，生产方式的循序演进，这是社会进步的终极原因。然而，这种发展、提高、演进是通过人的主观活动来实现的，而进步的杰出的伟大人物更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军事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需要通过暴力形式解除桎梏时，武装革命就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如此，执行军事任务的将领、统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就表现了出来。可见，军事人物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同历史发展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所以，一切伟大人物或著名人物从根本上说都是时代的产儿，中华民国这个断代的人物亦不例外。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最早在中国提出打倒封建帝制的响亮口号，并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率领革命党人历尽千辛万苦，终

于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民主共和国。尽管孙中山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弱点，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然而，推翻封建帝制解放中国被桎梏了的生产力这一伟大功绩，确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黄兴等人也因协助孙中山领导武装斗争建立了伟大功勋，从而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很快被手握重兵、擅弄权术的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倒行逆施，醉心于当皇帝，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前进与倒退的历史转折关头，颇具胆识和富有军事才能的蔡锷，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这场正义战争因符合中国人民大众的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仅短短数月，便以少胜多，击败了北洋军，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正是这一伟大功绩，奠定了蔡锷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永垂青史。

护国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并没有正常地发展，而陷入各派军阀在各自后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连年混战，饥荒遍野，民不聊生，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进行。为了消灭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由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因为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大众的意志，在广大工农群众支援下，只用十个月左右时间，就以十万之众，歼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四十万军队。可惜，这次正义战争被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所夭折。但是，北伐战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丰功伟绩，却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为北伐战争作出过贡献的高级将领也因他们的战功大小而确定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

所以，评价军事人物，无疑要考察他们在军事领域各方面的建树，

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哪些方面在同辈人中作出了瞩目的贡献，因为评价军事人物离开军事成就，就会脱离事物质的规定性。但同时必须考察他们的军事活动对社会生产所起的作用如何，因为这是评价军事人物的基本标准。

二、以“阶段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确定其基本属性。

历史发展是曲折复杂的，生活于其中而又能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其思想、经历也必然是复杂的。尤其是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发生空前的剧变，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各方头面人物的浮沉，都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情况。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和一定的事件、时间、地点、条件相联系，必然落下时代的“烙印”。而同一时期同一阵营中的人物，因其出身、经历、思想、个性的不同而显现出各自不同的活动特点。因此，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和曲折过程，熟悉重大变革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具体地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物的活动特点。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都经历了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少数人还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每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历史各阶段表现如何，一定要作具体分析，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其军事人物也必然是反动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物是可变的。有的人这个阶段坏，那个阶段好；有的前期反动，后期进步；有的前、中期反人民，后、晚期转而为人民，由反革命转向革命。这说明，反动统治阶级阵营中的人物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即使本质上肯定为反动的人物，也不能说他一件好事未做。同样，进步的革命领袖

人物，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也不能说一件错事、坏事未做。此外，还有个别人从革命堕落为反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因此，我们认为，对民国时期的军事人物应以“阶段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求比较准确地弄清他们的基本属性。

阶段论，就是具体分析民国时期各个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人民大众有什么要求？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做了些什么？他们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发展前进，还是开倒车阻挡历史向前，以便分清他们在各阶段的是非功过及功过大小。然而“阶段论”分析没有就此完结，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全面综合分析，以求在总体上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定性评价。应该说，“定性”评价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

用“两论”相结合的方法，既可见“树木”，又可见“森林”，利于正确评价。例如，我们分析程潜将军。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孙中山，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北伐战争中与共产党人合作转战湘、赣、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蒋介石排挤被解除军职，未与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曾率部在平汉铁路沿线抗击日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与陈明仁一起弃暗投明，率部在长沙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但是，一九四六年他在担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期间，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指挥所部在大别山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则是坏事。通过各阶段分析，综观程潜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多于他所做的错事、坏事，功大于过，应该评价他为“著名爱国将领”。

在整体分析时，要特别注意人物在历史转折关键时刻的思想行为与作用。例如，张学良将军曾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参加过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中支持吴佩孚、孙传芳，率部与国民革命军作战，“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也曾奉命“围剿”过红军。这些问题，作为研究张学良的军事活动不但不应回避，而且应当把史实、是非弄清楚，以达全面正确评价之目的。然而，所有这些与他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行动相比却是次要的。因为张学良出于抗日救国的赤诚，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惊险的手段，兵谏逼蒋抗日。这种有胆有识力挽狂澜的壮举，为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正是这一杰出功绩确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以“阶段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一次分析可以完成的，而要经过一个反复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例如，对蔡锷的定性评价，我们在军事卷撰写这个条目中就经历了一个多次探讨、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释文第一稿，定性评价蔡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征求意见时，有的同志提出这个定性评价未反映出蔡锷一生军事活动的特点。经过研究，第二稿改为“反清倒袁时期的著名将领”。第三稿无变化。进一步研究时，有的同志提出，这个定性评价虽有时代特点，但未能把蔡锷在军事上的建树充分反映出来，因为他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还编著了《曾胡治兵语录》和《军事计划》，后一书强调军队教育训练应着眼于全面提高军政素质，反对单打一，这在当时还是很有见地的。因此，第四稿改为“近代军事家、著名爱国将领”。后来在审稿时，有的同志提出，蔡锷在军事上有建树，似又够不上一个成熟的军事家。于是，第五稿又改为“近代著名爱国将领”。第六稿只在“近代”之前加了“中国”二字。后来，我们收集并研究了蔡锷在云南任都督时主持编著的《五省边防计划》，这是

一份针对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南边疆西拟制的保卫国防带有战略性的计划，富有远见。据此，第七稿改为“中国近代军事家”。

三、分类定性，全面反映，突出人物各自的重点和特点。

通过“阶段”与“整体”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同是国民党阵营中的高级将领，在性质上却有本质的区别，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其类型大体如下：

第一种。虽然原来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他们一生中在这个或那个阶段不可避免地做过有害于人民的事；但由于历史潮流的推动，或共产党政策的影响，促使他们觉醒，参加过民主革命或民族革命，或做过其他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后来进而转向人民阵营。纵观其一生，爱国进步是主流。如冯玉祥、张学良、程潜、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卫立煌等就属于这种类型。我们认为，这些人应定性评价为“著名爱国将领”。又如张自忠、吉鸿昌、马占山，根据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分别评价为“著名抗日将领”、“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抗日将领”。

对这种类型的人物，在撰写百科条目释文时，概括地记述他们戎马一生，但重点是反映他们军事活动中爱国进步的事实。如撰写《傅作义》条目释文，突出了他一九三三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一九三六年组织指挥绥远军民抗击日伪军进犯获百灵庙大捷；卢沟桥抗战后，率部参加忻口、太原、五原等战役，抗击日军；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起义，为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立了大功等。

第二种。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在这个或那个阶段有过进步表现，但综观其一生，总体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如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阎锡山、薛岳等，他们用自己行动书写的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远多于进步的表现，而且终未悔改。对这些人，撰写百科条目时，依其本来面

貌，突出反映他们的反动军事活动。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挫折北伐战争，调重兵对苏区工农红军实施五次“围剿”，抗日战争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六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等，在撰写《蒋介石》条目释文时，均作了如实的记述。但我们没有给他戴“人民公敌”、“美帝走狗”、“头号战犯”的帽子，连过去常用的“表面拥护革命”、“撕下‘左’派伪装”等词句也未使用，主要讲事实。

第三种。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阶段有功，在那个阶段有过。全面分析，其主旨并不是为国家和民族，突出的是为发展个人势力，但又因客观条件不允许，主观动机无法实现。对这种人一时难于从整体上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张发奎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撰写百科条目时，有功写功，有过写过，功过并存。

第四种。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生倾向进步，精研兵法，著述宏富，且有影响。如蒋百里我们定性评价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为“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在百科条目中，尽量突出其军事家的特点。例如，蒋百里的军事理论成就与他一生的军事活动是紧密相连的。他先后去日本、德国学习军事近十年之久，以后又多次出国考察军事。他在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军事高参、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务期间，从事了大量军事理论研究工作。他的著述在国民党将领中颇有影响。为《蒋百里先生文选》一书写序言和跋的就有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将军写道：“读到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的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必终于胜利之理，让我读了，更增加胜利信心”。

总之，分类定性之后，分别突出军事人物的各自重点和特点，是正确评价人物的必要表现形式。

四、敢扬善，不隐恶，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说来容易，做到颇难。因为国共两党虽曾两度合作，但敌对日久，生死拼杀多年；解放后一段时间之内“左”的思想影响严重，妨碍着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研讨民国时期的军事人物。此外，撰写人由于主客观原因，也受到一定的局限。现在，要把过去被掩盖了的某些人的某些历史事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既不因功两掩饰其过，也不因过而抹煞其功，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必须做到如下三点：

第一、对反面人物要敢于扬善，敢于肯定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对于基本属于反动的人物，绝不能认为他们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坏，一骂到底，无好处可言，即使办过好事，也是“伪装”、“投机”（当然有这种情况）；而应当实事求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探索事物的内在原因，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身为国民党总裁、政府首脑、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解放战争时期曾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他也曾做过符合历史发展的好事：在辛亥革命前后有过进步表现，北伐战争前期做了有益工作，抗日战争初期指挥正两战场作战，迟滞了侵华日军的进攻速度，到台湾后也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等。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应予肯定，否则难于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又如，对袁世凯这个残酷镇压革命，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头子，我们也不因他是千古罪人而泯没其在改革军制方面的进步。他吸取德国军队经验，仿照德国陆军编制，将新军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编队；习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官指导军事训练；开办随营学堂，培养军官等。从中国军制发展过程来看，与前人相比，这是改革，是进步，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尽管袁世凯抓枪杆子是为实现个人野心，但其行为在客观上起了改革近代军制的作用。这一点

应予承认。

第二、对基本肯定的正面人物不隐恶，实事求是地审慎地写出他们在历史上的污迹。这种情况多是指国民党阵营中因觉悟而投向人民的高级将领。对这样的人物，那怕是过去的劣迹较多，人民却因其觉悟而总是怀有好感，并且很容易对其劣迹采取宽容、谅解和既往不咎的态度，甚至有意加以回避。我们认为，对于从反动转向进步，以及晚节善终的人，怀有好感和同情是应该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百科条目撰写人，则应防止以感情代替历史。须知，正确评价人物，应包括其经历中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功过兼述。对正面人物不隐恶和对反面人物敢扬善，其目的都在于客观正确评价，以资后人借鉴。如冯玉祥将军，一生追求进步，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重要贡献，在军事上也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我们评价他为“中国近代军事家，著名爱国将领”。然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推动召开徐州会议，促成蒋汪会流，联合反共，并一度附和蒋介石积极清党，在历史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冯的这一历史污迹，有的同志在研究中提出，冯是正面人物，以不写为好。我们认为还是写上好。因为在那政治风云急剧变化的时刻，每个人对进步与反动的抉择都有其社会推源、时代特点，冯之举措终成历史；不写，形式上似为保护正面人物，实则使他的形象不能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出来。这样，就很难使人看出他是如何从一个旧军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经过曲折复杂的道路，转变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著名爱国将领。

第三、撰写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任何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思想、行动都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对于民国军事人物在军事上的建树和贡献，只要有其进步的一面，就应给予肯定。譬如，冯玉祥在治军方面，与当时的新旧军同相批，确

有独到之处。他强调对士兵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并制定了不准吸烟喝酒、不准嫖娼赌博、不准欺侮百姓、不准私入民宅、不准便服外出等五条戒律，而且身体力行。对违纪者一经查出责罚很重。他对部队强调并实施耐风寒、耐雨雪和善于近战、夜战的训练。所以冯军在当时各派系军队中战斗力是最强的。可是，有人不赞成这样写冯玉祥治军的长处，说“这么一来，冯军不是跟我们人民解放军差不多了吗。”不错，冯玉祥治军带有浓厚的封建家长统治的色彩，确有其致命的弱点，这也是西北军最终被瓦解的一条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按照人民军队的标准来要求他，对他治军的长处，在指出其弱点的同时，基本加以肯定，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须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新型人民军队，绝不排斥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在治军方面的优点、特点与贡献，而且还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为我所用。这说明，研究历史切忌主观想象，不能以今人苛求前人，不能以共产党人衡量国民党人，更不能戴着“左”视眼镜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是昨天，不是今天，历史已是既成事实，不是现在正在发生发展的事物。因此，只能承认和尊重，绝不能随意改变与否定。当然，后人对历史不是消极与无能为力，而是应从前人的正确与错误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评价其功过是非中得到启示，鉴往知今。

研究撰写民国军事人物，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今后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将有更多的民国军事人物待我们去研究、撰写。因此，我们的“初探”希望得到更多的专家、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①《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8页。

1986年11月3日